从词臣背景看真德秀与理学的关系

许 浩 然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西安 710049)

摘　要:有宋一代,理学之士与词学之臣是两个长期存在文化分野的士大夫群体。南宋晚期,随着理学的官方化,理学义理与词臣词学开始呈现融合之势。真德秀以词臣出身提倡程朱之道,成为复振理学的关键人物。然而在词臣履历仕宦的背景下考察真德秀与理学的实际关系,可以发现其早先词科入等,是依靠韩侂胄党派人物的指教与提携,与理学门墙存有深刻分野;后来韩氏被诛,真氏出于政治需要提倡理学,由此进入馆阁,但在文化上难以与理学义理契合;再后他退居地方社会,在文化上真正接受理学,但仍与纯粹的理学学者存有隔阂。词臣词学与理学义理在真德秀的文化立场中呈现共存相拒之势,此种情况一直延续至其重回朝廷担任翰林学士。

关键词:真德秀;词臣;理学

中图分类号:K 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5-0141-09

有宋一代,理学之士与词学之臣是两个彼此存在文化分野的士大夫群体:前者长期属于地方性的学术流派,讲论诚意正心,弘扬上古圣人传至当朝贤儒的义理之学;后者则是朝廷一贯认可的知识精英,草拟制书诏命,矜尚润色皇朝宏业的辞章之学。这两类士大夫的文化取向颇有分歧,彼此在人事上亦多矛盾。[①]然而,随着南宋晚期理宗一朝理学的官方化,理学文化与词臣文化开始呈现融合之势。真德秀为此一趋势的关键人物,他一方面试博学宏词科,出入馆阁翰苑,是宁宗、理宗两朝典型的词学之臣,另一方面又在地方修习义理之学,在朝廷提倡程朱之道,是庆元党禁以后理学复振的重要推动者。

那么真德秀是如何面对理学义理与词臣辞章这两种长期存有矛盾分歧的文化取向的呢？他本于词臣的出身背景,与理学的实际关系究竟如何？探析此中问题,不仅有助于了解真氏本人真实的文化立场,而且亦有益于从词臣文化的角度关照理学官方化过程之中的种种细节,或许可以为南宋文化史中此一关键节点开辟一个新的考察面相。以下我们拟先简述真德秀前辈人物,即孝宗一朝理学家与词臣的文化分野,作为论述的前提;其次以词科入等、馆阁任职、入选翰苑这些词臣的履历仕宦为背景,详细探讨真氏与理学界中人物、学术的远近关系,论述理学、词学在真氏的文化立场之中呈现的态势;最后评价此一词臣提倡理学的史实对于官方化中的理学所具有的影响。期望这一研究能够为以上问题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解释。

一、前辈人物:孝宗时期理学家与词臣的文化分野

孝宗时期,南宋士大夫文化呈现兴盛之势:理学思潮开始蓬勃发展,词臣文风显露升平气象。理学之士与词学之臣这两大群体的文化分野在此一时期体现得颇为明显。当时著名词臣如洪迈、周必大等人,先中词科,再进馆阁,后入翰苑,摛文擅藻,润色宏业,成就为一代制诰手笔,为辞章之士所称羡。然而理学中人却屡屡对词科之试发表

收稿日期:2016-06-10

作者简介:许浩然,男,江苏南京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① 相关的研究,参见许浩然:《从胡寅仕历看两宋之际的词学之臣》,《中华文史论丛》2014 年第 1 期;许浩然:《南宋词臣"文统"观探析——以周必大书序文为线索》,《文学遗产》2015 年第 3 期。

反对意见,与馆阁翰苑的文化氛围亦格格不入,以下我们通过简述一系列相关人事予以说明。

关于孝宗时期理学家对词科之试的反对态度,我们可举张栻、杨万里、朱熹、刘清之的事迹及言论。杨万里"初欲习宏词科",后经张栻劝导"此何足习,盍相与趋圣门德行科乎",遂"大悟,不复习,作《千虑策》,论词科可罢"①。朱熹曾经议论:"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②刘清之"欲应博学宏词科。及见朱熹,尽取所习焚之,慨然志于义理之学"③。张栻、朱熹明确反对词科骈俪雕琢的辞章之学,在他们的感召之下,杨万里、刘清之绝然抛弃了原先的趋试之志,转而服膺义理之学。

至于孝宗时期理学与馆阁翰苑的文化分歧,我们可举吕祖谦之事。吕祖谦的文化观念较为通达,不似上述理学家排斥词科,他于隆兴元年(1163)曾应试词科,并且入等。④ 吕氏虽不反对词科,但他的理学主张却在其以后的仕宦生涯中与馆阁翰苑的文化发生了碰撞。乾道、淳熙年间吕祖谦进入馆阁,历任秘书省正字、秘书郎。时任翰林学士的周必大曾向孝宗建言"(吕)祖谦不但能文,极知典故,翰苑须常用有学问之人,乃为有补"⑤,意欲举荐吕氏进入学士院,引导他走一条词臣的仕宦道路。然而吕祖谦在秘书郎任上却因编修北宋诗文总集《皇朝文鉴》一事与馆阁翰苑的氛围产生了冲突:吕氏借助《文鉴》所选诗文阐发理学思想,期望将编书宗旨"归之于道"⑥,而其他臣僚则认为该书内容有意显扬田间疾苦,指摘朝廷之过,有悖于馆阁润色之业。⑦ 当时资深的馆阁之臣中书舍人陈骙出面,明确反对吕祖谦晋升为直秘阁。⑧ 周必大为《文鉴》作序,以标准的词臣语调颂扬赵宋皇室功业⑨,欲将《文鉴》的性质引入御用话语的体系。吕祖谦对于该序深为不满,一读之下,即命弟子藏之。⑩

以上简述勾勒出孝宗朝时期理学家与词臣两大群体之间的分野,二者对于博学宏词科之试及馆阁翰苑文化所取的态度判然有别:前者与之格格不入,后者则倚之成就功业。这一分野是考察真德秀文化立场的前提,以下就请依次从词科、馆阁、翰苑这些词臣履历仕宦的背景考察真氏与理学的关系。

二、真德秀的词科之试与韩侂胄党的人事关系

如果说孝宗时期,理学家与词臣对于博学宏词科的不同态度尚停留在学术文化分歧的层面,那么真德秀词科之试的相关人事则更有着政治斗争的时事背景,即宁宗朝时期的庆元党禁。考察真德秀词科修习及考试的事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不少牵涉及党禁之中理学的对立面——韩侂胄一派的人事关系。

首先来看真德秀修习词科之学的师承关系,这里要提及真氏的词学之师傅伯寿与倪思,傅、倪

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三"德行科",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47—48 页。
② 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朱子全书》(修订本)第 23 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363 页。
③ 脱脱等:《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七·刘清之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2956 页。
④ 杜海军:《吕祖谦年谱》,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7 页。
⑤ 李壁:《行状》,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附录卷二,道光二十八年欧阳棨刊本。
⑥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695 页。
⑦ 参见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吕祖谦铨次:《皇朝文鉴》附录,《吕祖谦全集》第 14 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92 页。
⑧ 参见张端义:《贵耳集》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7 页。
⑨ 参见周必大:《皇朝文鉴序》,《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一〇。
⑩ 参见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吕祖谦铨次:《皇朝文鉴》附录,《吕祖谦全集》第 14 册,第 893 页。关于吕祖谦因编修《皇朝文鉴》而与馆阁翰苑文化产生冲突之事,详参许浩然:《从〈宋文鉴〉的编修看南宋理学与馆阁之学的分歧》,《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 年第 3 期。

二氏皆曾中博学宏词科，为当时的著名词臣。① 庆元五年（1199）真德秀进士及第以后，曾上谒时知建宁府的傅伯寿"请问作文之法"，所问者即为词科的"科目之文"②。嘉泰四年（1204）倪思知建宁府事，颇为赏识真德秀才华，又"以词科衣钵传之"③。

傅、倪二氏本于词臣背景提倡词科之学，他们在庆元党禁的背景下，更与理学中人存在政治分野。傅伯寿与理学人物的矛盾至为明显，《宋史翼·傅伯寿传》载：

> 及韩侂胄用事，（傅）伯寿首以启贽……侂胄喜甚，力荐之，召除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庆元元年……伯寿承侂胄意，草诏妄诋善类……伯寿尝（对朱熹）执弟子礼，憾元晦（按：即朱熹）登朝不荐己。及元晦罢归，请辞侍从职衔，得旨依旧秘阁修撰，宫观差遣。伯寿行词，有"大逊如慢，小逊如伪"语。士论薄之。……元晦卒，伯寿以党禁故，不上闻。遣人致赙元晦家，元晦家辞焉。④

傅伯寿原出朱熹门墙，后因怀恨朱熹不举荐自己，投向韩侂胄一派，在党禁中，为之草诏诋毁理学中人。其撰写朱熹宫观制词，颇致贬损之语。朱熹亡故以后，其家人拒绝傅氏赙仪，显然是与其断绝了师门关系。

至于倪思与理学的分歧，则较为隐晦。魏了翁为倪思撰写《墓志铭》，记载倪思从朱熹立朝至庆元党禁时期的言行，承认倪思并非理学人物，言其与亲理学的宰相赵汝愚关系"不合"，在朱熹入朝，人心归向的情况之下，其对朱熹"见之如他日"，但是绝对否认倪思在党禁时期与韩侂胄党联合排压理学。⑤ 此一说法其实有讳饰之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载：

> （庆元二年）二月，知贡举叶翥、倪思、刘德秀奏论文弊，上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悉见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矣。⑥

庆元二年（1196）为庆元党禁初期，当年的进士科考充斥着党禁的气氛，韩侂胄党徒刘德秀等人把持知贡之权，对理学士人大加贬斥。倪思亦知贡举，且与之共为一议。由此分明可见倪思倾向韩党的姿态。

傅、倪二氏倾向韩侂胄一派，与理学门庭存有分野，真德秀却追随他们，讲论词学。尤其是庆元五年（1199）真氏求教于傅氏之事，当时正值党禁，真氏却与理学的敌对者过从密切，此事日后遭到非议。与真德秀关系颇为密切的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对此有过一段议论：

> 文忠（按：即真德秀）犹及文公（按：即朱熹）之时，时党禁，莫之敢见。文忠已中乙科，以妇翁杨公圭勉之同谒乡守傅伯寿，尽传公（按：即真德秀）之业，未几中选，故不及门云，惜哉！⑦

叶绍翁对于真德秀在党禁之中追随傅伯寿而不拜谒朱熹表示惋惜，这其实是对其事致以微词的一种委婉表达。

其次来看真德秀词科入等之事，《四朝闻见录》载：

> 真文忠公、留公元刚字茂潜，俱以宏博应选。时李公大异校其卷，于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台取旨。时陈自强居庙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识文忠为远器，力赞韩氏，二

---

① 傅伯寿、倪思分别于乾道八年（1172）、淳熙五年（1178）中博学宏词科，参见傅璇琮、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考》，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90－991、1040 页。傅伯寿于庆元二年至三年（1196—1197）任翰林学士，倪思于淳熙十六年至庆元二年（1189—1196）任直学士院，参见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第 1 册，成都：巴蜀书社 2003 年版，第 715—717 页。

② 真德秀：《傅枢密文集序》，《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周密：《齐东野语》卷一"真西山"，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2 页。

④ 陆心源辑：《宋史翼》卷四〇，《续修四库全书》第 311 册，第 706 页。

⑤ 魏了翁：《显谟阁学士特赠光禄大夫倪公（思）墓志铭》，《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五，《四部丛刊初编》本。

⑥ 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269 页。

⑦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50 页。

人俱置异等。①

开禧元年(1205)真德秀应词科之试,考官李大异评其文"宏而不博",显有指瑕之意,但经过真氏岳父奔走权门请托关照,终得入等。其岳父所托之人陈自强为韩侂胄党徒②,其时任右丞相。③陈自强为推举真德秀而"力赞韩氏",此"韩氏"即韩侂胄无疑,叶绍翁故意以"氏"字讳其全名。由此可见,真德秀词科入等,就其事内情而言,颇有韩侂胄党派的人事背景。④

真德秀亲身经历庆元党禁,对于当时理学中人与韩侂胄党的尖锐对立以及傅伯寿、倪思、陈自强的政治立场定然知之甚详。他内心亦定非常清楚,其自身词科师承及入等之中诸多人事与理学门墙存有深刻的分野。

三、真德秀、杨简在馆阁之中的关系

嘉定元年(1208)四月,时任太学博士的真德秀上递《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三章,次月即闰四月,被召试馆职,旋除秘书省正字⑤,进入馆阁。《戊辰四月上殿奏札》的内容言及权臣当政之时妄开兵端、排击正道、刑罚失据种种弊端,要求革新。⑥ 此札第二章涉及理学,学界视其是真氏为理学正名之始。⑦ 其实,评价其札的整体意义,与其说此是真氏为理学的声辩之文,不如说更是一种时政的需要。此札上递的前一年即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韩侂胄因北伐失败被诛。⑧ 嘉定初元,政治更化,真氏在此之际,审时度势,发表议论,着意与韩氏旧政立异,提倡韩党旧日排压之理学,以符合朝廷当下的政治需求,他由此即很快获得了跻身馆阁的机会。至于当时真德秀在文化上对于理学的实际态度究竟如何,此可通过考察他与杨简在馆阁之中的交往予以说明。

嘉定元年(1208)杨简召除秘书郎⑨,与真德秀同在馆阁供职。杨简出于陆九渊之门,为一名典型的理学之士。其重视义理,对于辞章之学采取明确的排斥态度,如其《论治务》就曾议论:"骈俪之文大不典雅,惟助浮华,不可不罢。"⑩他的这一立场与崇尚摛文擅藻的馆阁氛围格格不入,显然易于引发人事上的不谐。真德秀《慈湖先生行述》载:"嘉定初元,先生(按:即杨简)以秘书郎召……同僚有过,微讽潜警,初不峻切,而听者常懼然。"⑪《四朝闻见录》载:"慈湖(按:即杨简)尝为馆职,同列率多讥玩之。"⑫以上述两则材料相参,我们可以看出杨简与馆阁同僚关系颇为对立:杨简以理学自居,以义理责人,同僚则视为迂阔,而对之嘲讽有加。真文所谓"微讽潜警,初不峻切",只是一种讳饰的表达。

那么真德秀与杨简在馆阁之中的关系又是如何呢？真氏《慈湖先生行述》又载:

> 一日见谓曰:"希元(按:即真德秀)有志于学,顾未能忘富贵利达,何也?"某恍然莫知所谓。先生徐曰:"子尝以命讯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后可以语道。"先生之于某,可谓爱之深而教之笃矣。惜其时方缪直禁林,役役语言文字间,故于先生之学

---

①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宏而不博博而不宏",第 16 页。

② 脱脱等:《宋史》卷三九四《陈自强传》,第 12034 页。

③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第 1 册,第 47 页。

④ 真德秀词科入等,就其事表面看来,与反理学的政治立场并无直接关系,因为开禧元年(1205)庆元党禁已弛数年,与真德秀同时入等的留元刚为留正之子,留正是党禁中被韩党排击的宰相之一(参见樵川樵叟:《庆元党禁》,《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1 页)。此时留元刚应试词科,而当权之韩党并未阻挡其功名之途,可见党禁时期的政治倾轧至此已经消弭。不过真氏内心定会意识到自己词科入等的人事背景与理学一派是存有分歧的。

⑤ 林日波:《真德秀年谱》,华中师范大学 2006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49—50 页。

⑥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

⑦ 林日波:《真德秀年谱》,第 50 页。

⑧ 脱脱等:《宋史》卷三八《宁宗纪二》,第 746 页。

⑨ 冯可镛、叶意深:《慈湖先生年谱》卷二,《宋人年谱丛刊》第 10 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640 页。

⑩ 杨简:《慈湖遗书》卷一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6 册,第 862 页。

⑪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五。

⑫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心之精神是谓圣",第 41 页。

> 虽窃一二,而终未获探其精微。①

杨简曾责备真德秀耽于卜问运命,未除富贵之心,真氏则言当时自己正“役役语言文字间”,对杨简之学未能“探其精微”。显然,当时真德秀更为崇尚辞章之学,希图以词臣文采见知朝廷,得以擢升,他在文化上并不能够真正实践理学义理的主张。其处馆阁之中,不至于是“讥玩”杨简之辈,但也绝非杨简的理学同道。

《四朝闻见录》还载有一则史料,言及真德秀与杨简在馆阁之中行事作风的差异:

> 嘉定初……时山东归附者众,荆襄帅臣列强弩射之使还。慈湖杨公简手疏其事以白上,谓此非仁术,且失中原心,以少缗钱赂银台通进司吏缴进……盖旧典独许从官缴奏自银台入。……真文忠(按:即真德秀)已居玉堂,终以官非正从,当制有所可否,亦止入札乞敷奏。杨公急于发上之聪明,故不暇用典也。②

杨简上疏言政,急于箴规献替。他并非侍从官,本无资格通过银台通进司投递奏疏,他便贿赂司中吏员,缴书投进。与杨简之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真德秀“已居玉堂”“官非正从”之时的行事风格,此当是指嘉定二年至七年(1209—1214)真氏任权直学士院时期之事。权直学士院虽入翰苑供职,但只是权任之职,仍非正式的侍从官。真德秀严守此一区别,避免通过银台通进司投递奏疏。杨简、真德秀行事对比之下,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前者以理学士人之风,崇尚义理,不拘形式,急于达成君臣沟通、致君尧舜的理想;后者则作为谨慎守成的馆阁臣僚,谙习朝廷典章制度,绝不使行为略有失矩之处。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真德秀进入馆阁前后,虽然出于政治的需要,曾经上递奏札,提倡理学。但他在文化上依然本于词臣的出处,希图以辞章见知朝廷,在行止上依然严守侍从之臣的典章,拘于形式的循规蹈矩,此与理学家的义理追求尚存有相当的差异。

四、从官卸任:真德秀的理学修习及其与黄榦之学的隔阂

嘉定七年(1214)真德秀在权直学士院任上与权相史弥远不和,请辞衔职,要求外放任官,由此开始了他近二十年的地方社会生活③,直至端平元年(1234)又入朝廷。在此时期的嘉定十四年(1221),真氏在家乡建宁建成西山精舍,与师友朝夕讲论程朱之道,尤尊朱子之学④,此时他在文化上才真正接近理学,其理学家的身份亦由此得以确立。

然而,如上文所述,真德秀在理学修习之前有着词科、馆阁的经历,成就过他词臣的身份,而这些经历在人事与文化上与理学存有分野。刘克庄为真德秀所撰《行状》叙及他辞职之时的言行:

> 时相(按:即史弥远)方以爵禄笼天下士,至有声望旧人,折节营进,反为所薄。公慨然谓刘公爚曰:“吾徒须汲汲引去,使庙堂知世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郡。时相曰:“禁涂在迩,胡为去也?”公答曰:“老亲生长田间,但知太守之乐,不知从官之荣。”⑤

此段记载叙及真德秀为求远离史弥远,不顾“从官之荣”而坚求去职。其表面虽是对侍从官职表达不屑,但行文之中其实处处凸显出真氏“禁涂在迩”的地位,具体说来,即是其权任直院的词臣之职。这种不自觉而流露出的对于皇帝侍从身份

---

①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五。
②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倪文节请以谏议大夫入阁”,第 82 页。
③ 在这近二十年的时段里,真德秀有一段很短的立朝时间,即其宝庆元年(1225)六月入朝,七月除礼部侍郎,八月去职之事,参见林日波:《真德秀年谱》,第 110—113 页。因为真氏这段立朝时间极为短暂,又未担任词臣之职,所以本文对其略而不论。
④ 参见孙先英:《真德秀学术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49 页。
⑤ 刘克庄:《宋资政殿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真公(德秀)行状》,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六八,第 14 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6504 页。

的矜尚之意,正是词臣群体普遍的心态。① 由此可以说,真氏转向理学的背景是一个从中央馆阁转移到地方社会的过程,此与当时理学学术典型的地方性特点有着本质的差异。真德秀以这样的背景讲论程朱之道,其实很难真正融入地方社会纯粹修习理学的语境。对此可通过考察他与朱子学派嫡系传人黄榦的交往之事予以说明。

黄榦为朱熹高足,又兼其婿,他一生的理学修习与仕宦人事基本处于地方社会,与中央朝廷无甚涉及。② 黄榦的治学背景体现出理学地方性的特点,此与真德秀的词臣出处判然有别。在一般的人事往来之中,真、黄固然颇为亲善,黄榦曾经称道真德秀"嗜学之志甚至",是理学的"护法大神"③。然而,在具体的论学语境之中,他们二氏却展现出学术背景的隔阂。黄榦在致友人信札中曾有议论:

> 真丈(按:即真德秀)所刊《近思》《小学》皆已得之,《后语》亦得拜读。先《近思》而后《四子》,却不见朱先生有此语。
>
> 《近思》旧本,二先生(按:即朱熹、吕祖谦)所共编次之日,未尝立为门目,其初固有此意,而未尝立此字。……今乃著为门目,若二先生之所自立者,则气象不佳,亦非旧书所有。……试与真丈言之,如何?④

黄榦对于真德秀所刊《近思录》提出意见,认为其书《后语》不当有"先《近思》而后《四子》"之论,体例上亦不当立有门目。其论是否确切,在此且不评断。所须特别注意的是黄榦信中"却不见朱先生有此语""《近思》旧本,二先生所共编次之日"这类语言,其真切地反映出黄榦多年在地方社会随侍朱熹之侧、受其亲身之教而对理学界中学术、人事知之甚深的背景。而这些背景对于此前一直身处理学之外的真德秀而言,显然是陌生的。由此可见真、黄讲论理学,在实质上绝非处于同等的语境,真氏更多地是在外部瞻仰,黄榦则是在内部论说。此即是真德秀理学与具有地方背景的朱门嫡传的隔阂所在。

然而,在真德秀身后,历代士大夫大多并不正视真氏与朱门的此一区别,而是将真氏叙述成为朱学正宗的承继者,如刘克庄为真氏作《行状》云:"公(按:即真德秀)生后于朱文公,而自谓受先生罔极之赐,资深守固,异说不能入。"⑤元代虞集作《西山书院记》云:"建宁路浦城县,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孙渊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筑室祠公。"⑥明代戴铣撰《朱子实纪》,列真德秀为朱子门人。⑦ 清代黄宗羲著《宋元学案》,列真氏为朱熹再传。⑧ 这一类叙述无形之中抹去了真氏与朱门嫡传之间的实际分别。⑨

---

① 汪藻《新除中书舍人孙觌可待制与郡制》云:"兹用时髦之俊,复居词禁之华。……具官某早膺抡擢,浸服禁严。文章为后学之宗,论议得近臣之体。"(《浮溪集》卷一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8 册,第 93 页)此为真德秀词臣前辈孙觌离朝任地方官之际的制文,文中充斥着"词禁""禁严""近臣"等等词汇,彰显出侍从之臣的身份,与上引真氏《行状》记载正可参证。

② 关于黄榦的生平、学术与政事,日本学者近藤一成作有研究,近藤氏将黄榦定义为地方社会的人物,参见近藤一成撰,优全、王孝云、孙晓艳译:《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黄榦的礼世界和判词世界》,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215—245 页。

③ 黄榦:《与李敬子司直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90 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49 页。原文"嗜"讹作"耆",正文引文径改。

④ 黄榦:《复李公晦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90 册,第 376—377 页。

⑤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六八,第 14 册,第 6529 页。

⑥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07 册,第 110 页。

⑦ 戴铣:《朱子实纪》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 550 册,第 444 页。

⑧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一《西山真氏学案》,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695 页。

⑨ 对于以上说法,学界已有辩驳,陈荣捷《朱子门人》将真德秀归入"非弟子亦非讲友"之列,评价戴铣、黄宗羲列真德秀为朱熹门人或再传为"名不符实之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5 页)。

五、从理学、词学两种文化的张力看真德秀的翰林学士之任

上文论述了真德秀馆阁词臣的出身,以及他本于此一出身,在理学修习之中与地方社会里朱门嫡传的区别所在,由此可见真氏复杂的学术文化背景:他的文化立场兼具理学义理与词臣词学两种取向。《鹤林玉露》载有当时士人杨长孺对于真德秀的两段记叙,其一云:

> 某(按:即杨长孺)昔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宫(按:当为“官”之讹),尝至某位中,见案上有近时人诗文一编,西山一见掷之……曰:“此人大非端士,笔头虽写得数句诗,所谓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非徒无益。”①

其二云:

> 汪、孙、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近时真景元亦然。②

嘉定元年(1208)闰四月真德秀进入馆阁以后,兼任玉牒所检讨官③,此时他已在朝堂上递过提倡理学的《戊辰四月上殿奏札》。杨长孺时任宗正寺丞,亲闻当时真氏曾以诚意正心之义理责人,似可见出真氏倾向理学一派的态度。然而在另一番语境之中,杨长孺又将真德秀归为汪藻、孙觌、洪适、洪遵、洪迈、周必大这一类南宋词科手笔的馆阁人物,真氏俨然又是典型的词学之臣。杨长孺的记叙正体现出真氏理学与词学两方面的文化取向。④

理学与词学的取向,之于真德秀的文化立场而言,并不只是共存之态,更呈现出一种相与抗拒的张力:一方面真氏本于理学立场贬低过词学辞章的价值,而在另一方面,一旦理学人物发表非议词科的言论,真氏又对之表达相当的反感态度。绍定五年(1232)真德秀编成《文章正宗》⑤,撰述《文章正宗纲目》云:“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⑥所谓“明义理、切世用”,正是典型的理学主张,而所谓“辞工”,则是词学追求的境界。由此内容,我们似可见出真氏尊崇理学而贬低词学的主张。然而《四朝闻见录》却载有一则材料与之形成鲜明的比照:

> (叶适)论宏词曰:“宏词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既已为词科,则其人已自绝于道德性命之本统,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于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止于举朝廷高爵厚禄以予之而已。……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文忠真公亦素不喜先生(按:即叶适)之文……以先生之文失之支离。文忠得先生《习学记言》观之,谓:“此非记言,乃放言也。岂有激欤?”⑦

叶适发表贬斥博学宏词科的言论,与前引朱熹之论颇为一致,甚至与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亦有相通之处,符合理学人物的通常观念。然而真氏却由此对叶适深致不满,指摘其文笔支离、偏激,其论似又是本于词臣辞章崇尚中和雅正的立场而发表非议理学的见解。

由以上比照,我们可以窥见真德秀文化立场内部的张力:他难以调和理学与词学二者的分歧,但又不能舍此就彼,故造成了自身学术文化取向内在的矛盾性。《宋史·王埜传》载有真氏这样一则事迹:

> (王埜)仕潭时,帅真德秀一见异之,延致幕下,

---

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文章邪正”,第 193—194 页。
②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文章有体”,第 265 页。
③ 林日波:《真德秀年谱》,第 50 页。
④ 关于南宋士人词学与理学文化取向并存的现象,学界已有论述,参见管琴:《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北京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
⑤ 林日波:《真德秀年谱》,第 100 页。
⑥ 真德秀编:《文章正宗》卷前,《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55 册,第 5 页。
⑦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宏词”,第 35 页。

> 遂执弟子礼。德秀欲授以词学,埜曰:“所以求学者,义理之奥也。词科惟强记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①

真德秀赏识王埜,纳入门下,意欲授以词科之学,王埜则崇尚理学义理,对词学表示不屑,真氏对之亦加器重。这则事迹正生动地反映出真德秀文化取向的矛盾性,他面对理学与词学的分歧,无法从根本上调和,或是决然作出取舍,只能采取两可的态度。这种矛盾性一直延续至真氏最后的仕宦生涯,即其翰林学士之任。

端平元年(1234)九月真德秀又入临安,除翰林学士,正式成为翰苑之臣。南宋之人记载其入朝之事:“童马入朝,敷陈之际,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第一义,继而复以《大学衍义》进。”②真氏又入朝廷,大力提倡理学,他在经筵侍讲,屡屡向理宗灌输程朱之道,俨然是一位典型的理学士大夫。后代认可其在理学官方化过程之中的重要贡献,主要指此而言。③ 当时真氏上递《谢除翰林学士表》云:“变　章绘句之习,岂薄技之能堪;以救时行道为贤,尚前猷之可仰。”④明确表达崇尚“救时行道”的理学主张,而贬低“　章绘句”的词臣辞章。

然而,在翰苑任职时期的私下场合,真德秀却又一反义理立场,对门生津津乐道辞章之学。刘克庄《跋拟制三道》载:

> 西山先生晚在翰苑,宾客满门。一日谓余曰:“某为词臣,终日困于应酬。忽一旦有宣锁,且奈何?宜稍谢客温习。”余曰:“先生何虑此?”先生曰:“此事久不拈弄则荒疏。君它日必居此地,不可忽老夫之言。”因曰:“文字须有素备,荒速中安得有佳语?”余请其说。先生曰:“如街谈巷语,及士大夫所传某人除某官之类,即题目也。暇日试拟为之,临时或可采用。”⑤

真德秀向刘克庄娓娓而言词臣撰写制文的种种细节,建议他平日须多择题目,勤加练习,这样宿构在胸,不至荒疏,临时草制才能应付自如。真、刘这番应答之语完全又是词臣之间交流草制经验的语境,与理学家平日的修习内容丝毫无涉。从中我们可以见出理学、词学二者的共存相拒之势,其实一直延续至真氏翰苑之任时期的文化立场。

六、余　论

上文我们由词科、馆阁、翰苑这些词臣履历仕宦的背景,论述了真德秀与理学的关系:真氏早先词科入等,是依靠韩侂胄党一派人物的指教与提携,与理学门墙存有深刻分野;后来韩氏被诛,真氏出于政治需要,上递奏札,提倡理学,得以进入馆阁,其时他崇尚词臣辞章,在文化上难以与理学义理契合;再后他退居地方社会,建立西山精舍,讲论程朱之道,开始在文化上真正接受理学,但其原先的词臣背景与朱学嫡传纯粹的理学渊源仍有隔阂;词臣词学与理学义理在真氏的文化立场中长期呈现共存相拒之势,此种情况一直延续至真氏的最后仕宦,即其翰林学士之任。

真德秀以词臣出身而提倡理学,显示了其复杂的学术文化背景,这种复杂性在南宋晚期变动的政局之中,较之纯粹的文化追求而言,显然更具有适应能力:韩侂胄党当权之时,真氏借其势力,以词科起家,易于获取仕禄,进入朝廷;韩党失势以后,真氏转而在朝堂提倡理学,符合当下政治需要,又得享清誉令名。相比较而言,理学义理纯粹的实践者如杨简、黄榦之辈,在韩党得势之时,只能受到排压,韩党失势以后,虽能短暂入朝任职,但终难适应中央馆阁的氛围,只能在地方社会处身立言。真德秀曾为其友人汤干作《墓志铭》,中有一段叙述云:

> 予(按:即真德秀)年二十六,始识升伯(按:即汤干)于都城。方是时,升伯以诗文称诸公间,雄丽秀拔,有古作者风致。后十余年,滥官于朝,又得其所为通变十二策者读之,论说娓娓,援古质今,奋然

---

① 脱脱等:《宋史》卷四二〇,第 12575 页。
② 周密:《癸辛杂识》前集“真西山入朝诗”,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43 页。
③ 孙先英:《真德秀学术思想研究》,第 249—251 页。
④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六。
⑤ 刘克庄撰、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五三,第 6 册,第 2634 页。按:原题“三”讹作“二”,径改。

有为国建策图久安之志。于是抚卷三叹,曰:“此贾谊长太息书也!”……又五六年,再见于延平,旋过予西山精舍,相与论洙泗、伊洛之源流与朱陆氏之所以同异者……殆非前日升伯矣。①

这段叙述虽是汤干之事,但其未尝不可看作是真德秀自身文化身份转变的一面镜子:开头所谓以诗文见称诸公,正是真氏早年耽习词学、词科入等的写照;末尾所谓讲论伊洛源流、朱陆异同,又是真氏后期服膺理学的写照;至于中间所谓撰著通变十二策,有贾谊文风之说,则对应着嘉定元年(1208)真氏反戈韩党,上递《戊辰四月上殿奏札》,提倡理学之事,其事难以与单纯的理学追求等而观之,却令人想见世事纷纭综错、人物转移升降的变局之中审时度势的策士之风。

真德秀一生正是以这种策士式的适应性而逐渐靠近理学的。在理宗一朝理学官方化的过程中,真氏身为词臣,接近皇权,由他大力提倡程朱,显然使理学更易于得到朝廷的认可。然而,真氏复杂的文化背景与单纯的理学义理难以真正融合,此种隔阂使得理学在向官方化发展的同时,逐渐失去了原先地方学术的纯粹性。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 Dexiu and Neo-Confuci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n Imperial Edict Drafter

Xu Haoran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Neo-Confucians and imperial edict drafters were two groups of scholar-bureaucrats with long-term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late Southern-Song Dynasty, with the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Neo-Confucianism, the philosophy of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Ci*-poetics of imperial edict drafters began to become integrated. With the status of an imperial edict drafter, Zhen Dexiu (真德秀) highly advocated Neo-Confucianism and became the key figure in the revival of Neo-Confucianism. However, if we investigate the 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Zhen Dexiu under his background as an imperial edict drafter, we can find that he started his political career in the officialdom when he passed the *Cike* (词科)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became an imperial edict drafter, and then got promoted with the guidance and support of Prime Minister Han Tuozhou (韩侂胄) 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group of officials in opposition to Neo-Confucians represented by Zhu Xi (朱熹), thus having great difference from Neo-Confucianism. After Han Tuozhou's death, Zhen began to advocate Neo-Confucianism owing to political demand, and as a result, he entered into *Guange*(馆阁) but found it hard to integrate himself culturally with the philosophy of Neo-Confucianism. And then, Zhen retired to local society and turned to really accept Neo-Confucianism culturally. However, Zhen still had divergence with pure Neo-Confucians. In Zhen's cultural stance, the *Ci*-poetics of imperial edict drafters and the philosophy of Neo-Confucianism were coexistent but contrary to each other. This situation lasted until his return to the imperial court to serve as a *Hanlin* academician (翰林学士).

Key words: Zhen Dexiu (真德秀), imperial edict drafter, Neo-Confucianism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真德秀:《汤武康(干)墓志铭》,《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二。